

摘 要

马相伯是三所大学（震旦、复旦、辅仁）的创始人，为我国社会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通过分析他离奇的家世背景、所受的特殊教育以及所处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力图对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及其特点作一个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考察了马相伯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考察了家庭因素诸如儒学渊源、天主教世家、家庭成员等对马相伯教育思想的影响。教会教育改变了他的知识结构，并向他灌输了先进教育理念。探讨了清末社会环境给马相伯提供的机遇和挑战。

第二部分叙述马相伯教育思想的内容。文章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一）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强调对西方科学技术和语言文字的学习。（二）汲取传统文化精髓，马相伯对传统文化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三）坚持教育独立，主张教育与政治、与宗教分离。（四）倡导自主之学，提倡学生学习独立、管理自治、思想自由。（五）采取先进的教学方法。马相伯综合了中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采取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由知到信的教学方法，要求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并提供了多思、专心和务实的学习方法。

第三部分阐释了马相伯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鲜明的时代特征，即革命性和反封建性；浓烈的个性色彩，即民主性和兼容性；局限性，即妥协性和软弱性。

关键词：马相伯，教育思想，形成，内容，特征。

ABSTRACT

As the founder of Zhendan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and Furen University, MaXiangbo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By analyzing his peculiar family background, special education and complicate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paper tries to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on Ma' 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character.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Part one: the observation of the forming of Ma' s educational thought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uch as Confucian origin, Catholic belief and family member on Ma' s educational thoughts is studied. It is discussed that Catholic education changes his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infuses him with advanced education ideology. The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provided by social environment in late Qing Dynasty is studied.

Part two: the narration of the content of Ma' s educational thoughts. It is generalized from following five aspects: (1) Studying advanced Western culture, especially emphasizing the study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language and character. (2) Absorbing the sou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s far as traditional culture is concerned, Ma takes an attitude of absorbing the best parts and abandoning the worst parts. (3) Insisting on the educ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proposing the separ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politics as well as

religion. (4)Advocating self-determination study, and calling for self-independence study, self-controlled management and freedom of thoughts. (5)Adopting advanced teaching method. Synthesizing advanced educational ideolog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Ma teaches students in accordance of their ability, follows in order and advances step by step and making students from knowing to believing. Not only does he request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quality, but also h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much-thought, heart-concentrated, reality-pursuing studying method.

Part three: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main character of Ma' s educational thoughts. It includes bright era character and intense personality. The former is revolutionary and anti-feudalism, and the latter is democratic and compatible. Ma' s educational thoughts, however, has its limitation——compromise and flabbiness.

Key Words: MaXiangbo, educational thoughts, forming, content, character.

引言

马相伯(1840-1939)，原名志德，亦名志常，后改名良，字相伯，别号“求在我者”，晚年称“华封老人”。江苏丹阳人，寄籍丹徒。他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家，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创始人。

马相伯早年从事教会事业，随后又投身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但传教不能救民于水火之中，从政也不能挽国势之颓危。于是他转而致力于教育事业，翼图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

1844年马相伯开始进入私塾，学习儒家经典。1851年独自至上海，求学于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依纳爵公学，受“神修”训练，并于1870年获神学博士学位，授职司铎传教。1876年，马相伯因与教会的矛盾离开耶稣会，投身于政界，任山东布政使余紫垣的幕僚，掌理文案。第二年调任山东潍县机械局总办，参加洋务活动。1878年马相伯奉李鸿章之命，调查山东矿务。1881年被派驻日本公使馆参赞，后改任驻神户领事。当年秋天，他回国探望患病的长兄，过南京，往谒当时轮泊南京的李鸿章。交谈过后，李鸿章将马相伯带往天津，马进入直隶总督的幕府。不久李鸿章派遣马相伯去朝鲜，充当朝鲜国王办理新政的顾问，1883年回国。1885年马相伯受李鸿章派遣调查招商局财产、账目，提出改革招商局和辟九龙为商埠的建议，有人赏识却无人付诸实践。1886年马相伯赴美国为李鸿章办海军筹措借款。在美国的会谈虽获成功，借款之举却受到朝廷的非议，功败垂成。马相伯深感“清政府的寿命已不得长久，旗人的脑满肥肠已万不足与有为”，^[1]便萌生摆脱官场的想法。同时，在从美国仓皇回国途中，马相伯乘机游历英、法、德、意、美诸国，考察商务并参观了牛津、剑桥等大学，得出了这些大学促成西方兴旺发达的结论，萌发了办一所“与西方大学齐头并进的新式大学”的想法。1892年，他再次任驻日本长崎领事、驻日本使馆参赞，但很快离职。1898年梁启超邀请马相伯到北京办译学馆，他欣然接受，却因政变的发生而作罢。

1900年，马相伯将祖遗产松江、青浦良田三千亩，“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2]不料，耶稣会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却并不办学。1902年蔡元培为求西学决心向马相伯学习拉丁文。马相伯考虑到他重任在身，中年事繁，不易坚持，便建议蔡元培从他任教的南洋公学中选一些青年来学习。因为成果斐然，“各省有志之士，远之如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的皆不远数千里间关跋涉而来……我们觉得有把组织扩大之必要”。^[3]再加上后来南洋公学学生因反对学校当局的专制压迫，集体退学，除多数人另组爱国学社继续求学外，另一部分学生则列入马氏门墙，震旦学院便应运而生。为创震旦学院，马相伯又拿出父亲行医、开店的积蓄现洋四万元和八处房产（价值约十余万元），加上捐献的1900年的三千亩良田，作为震旦的办学基金。震旦初创时，一无校舍，二无师资，马相伯凭自己与法国天主教会的渊源，借徐家汇天文台之余屋为校舍，又以私谊延请耶稣会教士义务任教，教习各国语言，以培养翻译人才、研究近代科学为宗旨。他说：“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者，请归我。”^[4]震旦无论在课程设置上，还是在教学方法和管理制度方面，都走在时代潮流的前端。当时远在日本的梁启超盛赞到：“吾今乃始见我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喜欲狂。”^[5]而于右任认为：“我国之有新式学校，业已三四十年，其含有国家民族之意识，致力于近代科学，而不受殖民地教育思想束缚者，实以震旦开其新纪元”。^[6]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中某些人阴谋夺取震旦学院的领导权，他们强迫马相伯住院养病，任命法国神父南从周管理学校。“南公尽改旧章”，加强宗教宣传，企图改变学校性质，把学校变成法国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教会学校。此举引起学生的愤慨而集体退学。马相伯毅然支持学生的爱国主义行动，辞职离校。震旦学生的退学举动，是为抵制外国传教士的侵夺，捍卫国家教育主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实属创举。离开震旦以后，马相伯即召集离校学生商议复校办法，推定于右任、叶仲裕、邵力子等人协助他筹办复校事宜，请两江总督周馥协助拨款借屋。聘请社会名流严复、曾铸、萨镇冰、

熊季廉、袁观澜、狄葆贤等二十八人为校董，协助募集学校基金，共同管理学校，校名为“复旦”。马相伯自任校长，由于师资和资金匮乏，六十六岁的马相伯仍担任法文教授，“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

1906年马相伯应两江总督之请，赴南京讲演宪法精神，剖析民主、君主政体之得失。1907年秋，梁启超、徐佛办、蒋智由等在日本成立立宪派组织政闻社，马相伯任总务员。1909年马相伯被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江浙诸省联军总司令部，被任命为外交部长。1912年马相伯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14年后，他历任政治会议、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

在这期间马相伯还致力于学术文化事业，他与英敛之“鉴于我国教育的落伍，科学的幼稚，思尽力以补救之。爰本服务国家之旨，振兴公教教育之意”，^[7]上书罗马教皇，建议教皇“多遣教中明达热切诸博士，于通都大邑如北京者，创一大学，广收教内外之学生，以树通国中之模范，庶使教中可因学问辅持社会，教外又可因学问迎受其光。”^[8]1915年，他又协助英敛之共同筹办辅仁学社（即辅仁大学前身），“以发展中国固有之文化，介绍世界科学新知识”。^[9]同时他把自己的薪金都用来捐办启明、静宜、培根等学校，还曾与严复、梁启超等人共同筹建类如今日研究院的“函夏考文苑”。目的在于“网罗全国积学之士，校勘古籍，编纂辞典，奖励著述，表彰硕德”，^[10]惜未办成。

袁世凯称帝后，马相伯痛加抨击，提出“天下之盗，莫大于君主”。并写下大量的文章抨击袁世凯尊孔读经，订孔教为国教的政策。1919年，马相伯厌闻政事，主要精力放在整理旧稿，从事译作，只对宗教和教育事业仍很关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再一次在马相伯的心理激起了波澜。他发表演说、写文章，号召团结抗日，呼吁人民自救，被尊为“爱国老人”。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拓荒者，陈毅同志在安葬马相伯时说：“马相伯老先生是一位反帝爱国者，也是杰出的教育家，他毁家兴学，办了不少学校；复旦和震旦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为祖国培育了不少人才，他为人民作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11]

然而，史学界对这样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马相伯的研究资料主要包括：（一）钱智修编《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年谱》，刊登于1937年5月16日《中央日报》上；（二）张若英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第六十七辑影印本；（三）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北平上智编译馆，1947年版；（四）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续编》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五）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据本人收集，研究马相伯的论文大约有80余篇。其中宗有恒、夏林根编的《马相伯与复旦大学》一书中收集了47篇，其它便散逸于报刊杂志当中。其中最具参考价值的是李旻的《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刊于《镇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三期，宋潍红的《马相伯教育思想述评》，发表在《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三期上，以及陆永玲的《站在两个世界之间——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附录于朱维铮编的《马相伯集》之后。前两篇注重于马相伯教育思想内容的论述，而对他思想的形成过程论述很少，后者则偏重于其背景和教育实践的介绍。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马相伯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强调了马相伯的家庭、所受的教育以及清末的社会环境对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全面的阐述了马相伯教育思想的内容。深刻揭示了马相伯教育思想的特点。文章还十分浅薄、稚嫩，请各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第一章 马相伯教育思想的形成

事物的形成和发展是内在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马相伯教育思想的形成必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离奇的家世背景、与众不同的教会教育和风雨飘摇的社会政治环境。

第一节 家庭的影响

家庭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和深远的影响，社会和时代的要求都通过家庭在儿童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在教育顺序上看，首先是家庭教育，然后才是学校教育。弗罗姆说：“家庭是社会的精神媒介，通过使自己适应家庭，儿童获得了后来在社会生活中使他适应其所必须履行的职责的性格。”^[12]马相伯的家庭既有深厚的儒学渊源，又虔诚信奉天主教，家庭成员又多为时代俊杰，这不能不对马相伯的教育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1. 深厚的儒学渊源

马相伯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二十一代远祖马廷鸾，在南宋末年做过宰相，以文才称世。马廷鸾的儿子马端临为元朝有名的儒学教授，著有《文献通考》。《文献通考》记述了宋以前的田赋、钱币、户口、征榷、土贡、选举等制度，是我国典章制度较详之书，此书与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并称为“三通”，后人认为《文献通考》“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于《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得也”。^[13]马相伯的父亲马松岩是位私塾，虽无功名，却也饱读诗书。

由于深厚的儒学渊源，马相伯最早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被寄予了沿袭家庭读书正业的期望。他五岁便入塾受儒家经典教育，泛舟于四书五经、子曰诗云的古代知识海洋里，饱经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八岁时，家里另外请了一个陶姓老师教他读四书五经。基于对“中国经典是使牧师取得知识分子身份所必须的”的认识，教会学校也开设了国文经学课程。已有国学根底的马相伯甚至还因此初尝了当老师的滋味。马相伯在早期仍意图走“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他在丹阳参加了科举考试，并取得生员的资格。后来他更把考取功名的希望寄托于他的学生，在他任徐汇公学校长时，常常亲自送学生赴试。到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他还曾想在经学上费一番功夫。而他的言论著作中也处处透露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儒

学的吸收和利用。深厚的儒学根底，使马相伯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将之付诸以后的教学实践中。他继承了儒学中“仁爱”的思想，对学生十分的关心爱护，常常和学生促膝谈心，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捐款兴学无疑是儒家宣扬的“义举”。同时马相伯在办教育的过程中还汲取了儒学教育中一些先进的教学思想，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有教无类等。

当然，马相伯并不是全盘接受儒学思想，他批判了儒学中的糟粕如三纲五常等，反对传统教育中呆滞、不合理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认为传统教育是“奴隶之学”，使人沉湎于繁琐的考据和空洞无物的八股文，脱离实际，无补时艰。私塾里的老师只教句读之法，只教字音，不讲字义，一般孩童也只象唱山歌般跟了老师，莫名其妙地咿唔诵读。学校教育只重记忆不重思考。虽然他对私塾刻板保守的教育方法颇有微词，常谴责其为害人之物，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从传统教育中获得的古典知识，使他得以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待中国文化的价值，这对他办学、从教有着很深刻的影响和启迪作用。

2. 天主教世家

马家信奉天主教的历史可追溯到利玛窦来华时期，马母沈氏也出自当地基督教世家，马家长女马相伯的大姐嫁的是青浦籍天主教世家朱氏。马相伯在道光二十四（1844）年四月十七日就“领天主教洗礼，圣名若瑟”。^[14]

由于信奉天主教，马家常弥漫着天主教文化的空气。生活这样的环境中，马相伯的心灵较少受到落后的传统文化的摧残，较多的受到现代文明的熏陶，性情得到健康的发展。另外，基督教的教义对马相伯的教育思想产生了影响。基督教教义中主张平等（“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彼此兄弟姐妹”）的思想使马相伯认为“天子也和我们一样，同是有生有死，在上帝之前；同是平等，并没有什么神奇”。^[15]他在办学过程中对学生一视同仁，并主张妇女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基督教主张牺牲精神（效法耶稣为世人殉难的十字架精神）。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

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16]耶稣这种殉道精神和救世精神使马相伯钦佩不已，并对他的人格风范的塑制以及他日后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为了祖国的社会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舍肉体劳苦于不顾，置生死存亡于度外，坚持办学，培育人才，艰苦卓绝，百折不回，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由于天主教的信仰，马相伯才有可能成为近代中国内地第一所传授西方知识的学校——徐汇公学的第一批学生。由天主教作媒介，他比许多成年后改习西学的儒生更易接受西方近代文化，从而与严（严复）辜（辜鸿铭）伍（伍廷芳）并称为“儒染欧洲文化最深”的人物。同时，在清末掀起的一波一波反教高潮中，由于信奉天主教，马氏兄弟一直都被排斥在清政府较高统治机构之外，政治上的失意使马相伯转而寻求到教育这一用武之地。

无庸讳言，天主教信仰也给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带来了某些消极影响。天主教忍耐、顺从、守贫、安分等观念意识，使马相伯缺乏彻底的反抗精神。在法国天主教会试图夺取震旦学院领导权之初，他采取忍让的态度，直到学生奋起反抗时，才采取抵制态度，使南从周得以顺利地掌握震旦学院的领导权，导致震旦成为他人的嫁衣裳。由于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在人生失意的重要关头，马相伯便产生依附于教会的想法。1900年他将家产三千亩地捐给天主教会作兴学经费，希望教会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1903年马相伯办震旦学院时“考虑到个人建设，势不能久，故请托耶稣会团体以期长久”，^[17]又因师资缺乏，故“请耶稣会士，以襄其成”，^[18]而校舍是借用教会在徐家汇天文台的旧房子。却没有料到“借地借才”导致“教育之权界不分”，为后来的震旦学潮埋下了伏笔。不过就总体而言，天主教信仰对他的影响积极的方面远远超过消极的方面。马相伯之所以被人民长久崇敬，原因之一在于他具备伟大的人格风范，而这一人格风范的塑制又显然离不开天主教信仰所起的作用。

3. 家庭成员的影响

家庭成员中，对马相伯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母亲，因为“父母

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社会信仰、规范和价值观等首先通过父母的过滤而传给子女。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性格的发展……”，^[19]“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态度是影响儿童性格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20]马相伯的父亲马松岩是位塾师，因体弱多病，常阅医书，遂转业行医，曾在镇江开设药铺和米布店。他惜老怜贫，常免费为穷人看病，给患疮疥痈疽者洗涤、敷药，一点也不怕龌龊。受父亲的影响，马相伯一生乐善好施，视钱财如粪土。他将所有的积蓄尽献给震旦和复旦，平时的薪金又用来资助培根、静宜等学校的创办，以致晚年仍不得不靠翻译生活。

母亲姓沈，家教素来很严，对于她的儿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肯放松一步，说话不许带污言秽语，吃饭不许挑肥拣瘦……在她的培养督导下，马相伯成为一个有教养能克己的孩子。马相伯说他“后来处世接物之不肯薄待人或对人无理，皆在此种下了因子”。^[21]另外，沈老夫人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马建忠和马相伯先后脱离天主教会从政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临死之时仍拒不接见马相伯，她说：“我的儿子是神父，你既不再是神父，我也不见你”。这件事对马相伯打击很大，也是他放弃仕途，转而投向文化教育事业的原因之一。

马相伯兄弟五人，二人夭折，在活下来的三人中他排行第二。他大哥马建勋，长大后投奔李鸿章，当过淮军粮台，马相伯和马建忠长大后脱离教会步入仕途、追随李鸿章办洋务均与他有关。马建勋当粮台的过程中累积了一些家财，单在金坛就置地一万亩，在松江泗泾也置下三千亩。马相伯去徐州传教时，曾请求兄长捐出二千两银子赈济灾民。然这一传统的义举却遭到教会的斥责，认为会士有守贫之愿，个人不得蓄产，放赈也必须以教会的名义。结果闹到马建勋带领兵弁上门寻衅，要求教会放人。经过这一闹，马相伯渐渐认识到教会无法实现其救国救民的理想。同时，随着李鸿章总督两江、直隶，执掌南北洋通商及外交事务，各级淮军将领出任各地督抚、道台，马家在地方乃至中央的官场上的道路畅通起来。一边是中兴大业，荣华官场，一边却是寂静忙碌的神父生涯，且受到外国传教士的压制。马建勋缔造的马家的荣华，使马相伯献身天主教的信心逐渐动摇，民族意识逐渐浓烈。最后终于跟从兄长进入了李

鸿章的幕府。马建勋死后无嗣，由其母主持，将其财产分析，一部分作为公产，供祭祀及救济贫苦族人之用，大部分给马建忠，一部分给马相伯，这些财产就是马相伯创办震旦大学的大学基金。

弟弟马建忠很早就加入李鸿章幕府，他精通西学，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助手，著有《适可斋记言记行》和《马氏文通》，是马氏兄弟中才华最横溢的，相伯对这位弟弟爱护有加。1894年冬，马建忠议设翻译书院。提出习译“各国之时政，居官者考订之书，外洋学馆应读之书。至于算法、几何、八线、重学、热光、声、电、以及飞、潜、动、植、金、百之学，性理格致之书，亦择其尤要者列为逐日课程。”^[22]1900年8月，李鸿章因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京，匆匆来沪搞“东南互保”，马建忠随李至行轅襄理外务，事繁且累。后因沙俄突然来电，借机寻衅要挟，电文长达七千余字，马建忠冒酷暑勉力译成，因而病倒，两天即去世。这对马相伯打击很大，伤感不已，促使他下决心捐产兴学。一方面是适应时代的发展培养英才，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实现弟弟的遗愿。再加上马建忠的逝世，自己又已年过花甲，恐不能继，才产生托付于耶稣会团体的想法。

第二节 教会教育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欧美列强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开始在中国领土上为所欲为。在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同时，欧美传教士也纷纷涌入中国，意欲实施宗教占领与文化渗透，教会学校即于此时开始成立，在此以后近百年的时间里，教会学校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官办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了一席之地。据统计，1876年基督教在华有男日校177所，学生2991人；男寄宿学校31所，学生647人；女日校82所，学生1307人；女寄宿学校39所，学生794人；传道学校21所，学生236人。学校总数350所，学生总数5975人。^[23]当然教会办学并不是为了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是希望通过办学校，用中国经典、西方历史、科学和基督教教义来培养未来的基督教工作者。对此西方教会毫不讳言，“倘若基督教学校能产生出持有基督教人生哲学和富

于道德裁判力的领袖人才，倘若他们能参与指导中华文化和国家生活进步的方向，而且能实力令这种进步得以实现，这便是基督教育永久特殊贡献。”^[24]重视宗教教育是教会学校为“推进上帝的事业”的性质决定的；但他也注意自然科学教学，开了我国学校理科教育风气之先。英华书院^[25]的章程内规定该校“既教授中国的知识，又教授欧洲的知识”。^[26]而1842年由澳门迁往香港的马礼逊学堂^[27]所设的课程也包括中文、算学、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和英文等，还曾开设化学课。^[28]因此教会大学也是西学东渐的载体。中国人通过教会学校的启蒙教育，掌握了一般的科学知识，同时也有机会接触了西方社会，而科学知识的输入势必会引起思想的变革，势必间接、直接的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教会学校除培养了象梁进德（玛礼逊助手梁发的儿子，他担任了美国特使顾盛的助手，为其出谋划策）这样的帝国主义侵略的鹰犬之外，也培养了一些“西学”人才，马相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849年，江南霖雨为灾，当地一些天主教徒无力抚养子女，把孩子送进教堂，要求救济。教堂顺水推舟，借了几间茅舍，办起一所学校，以耶稣会创始人、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的名字命名，这就是伊纳爵公学的雏形。1851年冬，马相伯进入伊纳爵公学（后改为徐汇公学）学习，在这儿受教会教育长达十九年。以下是马相伯受教情况表见表1-1：

表 1-1 马相伯在徐汇公学受教育情况^[29]

时间	学习内容
1851年	入学，学普通科学。
1853年	肄业，并教国文经学。
1854年	诵习法文及拉丁文。
1855年	诵读古文。
1857年	得文科奖赏。
1858年	得圣学奖赏，圣学及研究天主教教义。
1859年	得圣学奖赏。
1861年	赴苏州救难民。

1862年	入徐家汇天主教创设之耶稣会初学院为修士，研究专门学问。
1864年	研究中国文学及拉丁文学，发神贫、贞洁、听命三愿。
1865年	在耶稣会肄习士林哲学，同时还有算学与自然科学
1866年	在耶稣会肄习士林哲学。
1867~1870年	肄习神学。
1870年	得神学博士学位，并授职为司铎。
1871年	至南京传道，旋专心研究科学。
1872年	调任上海徐汇学校校长兼任教务。
1874年	任徐汇公学校长，兼耶稣会编纂，译著《数理大全》
1875年	研究天文、数学。
1876年	退出耶稣会。

教会教育给马相伯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教会学校改变了马相伯的知识结构。耶稣会历来就有重视数学与科学研究的传统，据记载，当年在徐汇公学中“举凡辣丁、英、法各文，与夫声、光、化、电诸学，时人所未及窥见者，已莫不一一教授，作新学上之宣传提倡”。^[30]进入教会学校以前，马相伯一直接受着中国的传统教育，从未接触过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就读徐汇公学以后，他对数学和天文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我研究数学，几乎发了狂，夜间睡觉的时候，仰视帐顶上，都隐隐约约，闪闪烁烁地出现了许多数目字，梦中也发现到处都是数目字”。^[31]他研究数学时，如有心得或新的发现，常常笔之手册，后来竟积至一百二十多卷，他自己把这些笔记拟了个名字，叫做《度数大全》。教会学校奠定了马相伯坚实的数学根底，训练了他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虽然当时他们传授的西方文化还极为有限，但无论如何，它毕竟给马相伯打开了一扇了望新世界的窗口。从这扇窗口，他看到了发达的西方，他看到了四书五经、子曰诗云所无法告诉他的新天地。西方参照系的形成，广泛的世界性视野的拓展，使马相伯的知识结构有意无意地被置于中西文化交汇、纵横交互选择吸收的立体

网络系统之中。从此马相伯的知识结构显示出鲜明的开放、综合的宏观走向；他再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封闭自足的狭隘的个体本位的文化传统之中，而进入了世界文化的大系统并获得了一种现代开放意识，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仍是这个知识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具备现代人的思想素质是马相伯后来决心开办“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的内在动力。

第二、教会教育向马相伯灌输了先进的西方教育理念。西方传教士反对中国传统的专事记忆的教学方法，“认为实验室的科学实验的运用是发展思维的最佳方法之一”。^[32]在教会学校读书期间，马相伯也曾经亲自做过化学的实验。“拿了一只真空的瓶子制造煤气，居然可以点一二分钟之久。他也曾拿了一根玻璃管擦羊皮布，居然可以吸纸屑。他常常拿这些物件试验当作消遣的玩意儿。”^[33]这种亲自从事科学实验的经历，使他具备了注重观察与实验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这对他一生的事业裨益匪浅。同时，教会学校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大环境中形成一个较为开放的环境。与传统教育相比，教会学校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接触，思想比较活泼且享有较多的自由”。^[34]西方的自由放任主义和民主社会价值观，政治参与、竞争，职业自主性和多样性都给马相伯的思想以巨大影响。使他后来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由思想和民主意识。另外，由于传教的需要，耶稣教会十分注重教士修辞和演讲能力的培养，他们要求修士用一、二年或三年的时间修文学。因此马相伯广泛涉猎于中外古典文学当中，并成为“天下第一演说家”。再者，由于宣扬“平等”和传教的需要，教会学校师生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关系较为融洽，不象中国传统教育中那般等级森严。徐汇公学意大利籍校长兼教授晁德莅(Ange Zottoti 1826-1903)是一位兴趣盎然的汉学家，意大利那波里人。他后来完成的拉丁文巨著《中国文化教程》，收有各种字画、《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十三经》、文章尺牍、诗文歌赋等，是早期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范本。他学问渊博，教学认真，品格正直，对中国人同情友好，深受马相伯和他的同学的喜爱，马相伯尊其为“晁教习”。他对马相伯的影响不仅仅在他教马相伯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和致知学即世俗所谓哲学（从古代哲学到现代哲学），

使之受到西学的熏陶，并任他为国文经学老师，使之获得宝贵的教学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常常教马相伯为国努力，使之成为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士，也是他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的引路人。受这种教育思想的影响，马相伯十分注重师生之间的交流，常常利用同学生同桌吃饭的机会，同学生谈心，讨论问题，还建立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同学生交流思想。

教会教育尽管在内容和方法上有不容置疑的先进性，但毕竟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是在不平等条约的卵翼下诞生的，带有很浓的奴役性和宗教色彩。同光时期，随着国势的衰败，新来主教、会士已渐萌轻视中学之心。马氏兄弟长住朝南两室，1873年修院接受了从巴黎省派来的外籍教士，两人因此被调至北向房间。^[35]此事对他们的打击很大，以为有伤民族自尊，同时也深刻感受到民族富强的重要性，产生对教会的抵触情绪并最终叛离教会。另外，教会开办的学校，首先是传教机关，其次才是学校，其宗旨归根到底是培养学生的“基督化人格”。从表 1-1 中我们也清晰的看到教会学校对宗教教育的重视。即便如此，教会教育还是为马相伯教育救国之举提供了深厚的知识和理论基础。

第三节 清末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政治上黑暗腐败，经济上民穷财尽，军事上软弱无力，文化教育上空疏无用，国家已到了崩溃的边缘。面对残酷的现实，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开始掀起教育改革的浪潮。

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认识到，旧教育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仿照资本主义教育兴办新式学校，以培养洋务人才。他们仿效西方学校在上海、天津等地相继开办了水师、武师、电报、医学等新式学堂，他们改革了传统教育只重儒学的教育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发展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一代新人。“这是中国新教育的萌芽，开中国近代新教育之风，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在中国实施的先声，为中国以后建立新学制奠定了基础，是有重要影响和历史意义的，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开端”。^[36]

随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深刻的民族危机，也提出了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等教育改革的主张。戊戌政变后，随着变法的失败，维新派所创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倍受摧残，京师大学堂却是幸存者。而变法期间，许多省份都在积极筹办设置新式学堂。各地公私立学校发展很快，尤其是私人设立学校得到很大的鼓励。据梁启超记载：“政变以后下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者尚纷纷见也。”^[37]

此时，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攻击下，也蓦然醒悟到“自戊戌政变，新旧交汇，继以庚子之乱，国势危如累卵，非广设学校，士子改习泰西有用科学，无由储备人才，挽回国势”。^[38]清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如张之洞（湖广总督）、刘坤一（两江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都递上了他们的改良奏议。他们一致指出，改良之本，在育人才。根据这些奏议，从1901年8月到1902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法令。这些法令要点如下：

- (1) 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文”，代之以阐述四书五经，讨论中国政治，以及关于外国政治、艺术的策论。停罢传统的武科，在新式学堂兼习武备。
- (2) 派学生出国留学。
- (3) 改传统教育机构为新式学堂。所有省城考试机关和书院改为中学堂，各省再设若干小学堂。这些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是儒家经典、历史、自然科学、中国和世界政治。
- (4) 重开北京的京师大学堂。

同时，为建立全国范围的近代学校制度，清政府根据张百熙的建议，在1902年8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虽然这一章程并未付诸实践，但这是中国引进近代学校制度的首次尝试。

清政府这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开放了社会风气，拓宽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传统教育已不能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需求，他们急需一所能满足他们求知欲的学校。教育改革，尤其是实业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繁荣，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迫切需要新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为马相伯开办学校提供了原动力。另外，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的政策为马相伯办学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

些改革措施为马相伯提供了借鉴。从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震旦学院章程》、《复旦学院章程》的课程对比表（见表1-2）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复旦和震旦课程的设置与《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的要求基本一致。

表 1-2 各种章程所学课程对照表

	《钦定高等学堂章程》 ^[39]	《震旦学院章程》 ^[40]	《复旦公学章程》 ^[41]
文科	伦理、经学、诸子、词章、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外国文、物理、名学、理财学、体操	古文（希腊、拉丁文）、今文（英、德、法、意等）、哲学（伦理学、论理学、性理学）、历史、舆地、政治（社会、财政、公法）	伦理学、国文、英文、法文、英法或德文、历史、地理、数学、论理、心理、理财、法学、簿记学、体操、音乐、拉丁文
理科	伦理、中外史学、外国文、算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及矿产学、图画、体操	物理学、化学、象算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农圃学、卫生学、簿记学、图绘、乐歌、体操	伦理学、国文、英文、法文、英法或德文、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动物、植物、测量、图画、体操、音乐、拉丁文

深厚的儒学渊源和世奉天主教的特殊家世背景使马相伯的思想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却又能不受传统的束缚，表现出较强的开放性，更易于接受中西文化的精华。多年的教会教育给了他丰富的西学知识和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使他产生了近代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清末教育改革为其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如果说马相伯的教育思想是株幼苗，那么他的家世背景就是他赖以生存的土壤。教会教育为其提供养料，幼苗有区别的加以消化、吸收。清末的社会政治环境则是变幻莫测的气候，它为幼苗的成长提供所必需的阳光雨露，也用暴风骤雨来考验和锻炼它。

第二章 马相伯教育思想的内容

第一节 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

近代以前中国一直认为“中国者，天下之中”，对待域外诸邦，则形成了“内夏外夷”和“以尊临卑”的心理定势。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破门而入，古老的中华帝国遭到了数千年未有的变局。自此以后，天朝帝国开始逐渐崩解。而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正是从此带着沉重的忧患意识而睁眼看世界，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艰辛历程。

马相伯作为受中西文化濡染甚深的弄潮儿，始终认为拯救民族的唯一希望在于从根本上汲取西方文化的精髓，并与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相融合。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论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42]，也就是“中体西用”论。马相伯却坚决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认为西学自有体用，如果只抓住他的用，不顾它的体，就只能“徒袭皮毛”。

和同时代许多有识之士一样，马相伯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达是当时西方国家强盛的首要原因。他十分重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说：“立足于二十世纪科学之世界，必赖科学的发达，始足以自存。中国今日之危亡，实根因于科学之落后。”“欲科学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43]又说：“今世何世，生存之竞争，不根于实业，实业之发皇，不根于科学，可乎？”^[44]马相伯提出“拿科学知识，兴国民经济”^[45]的口号。他要求学习西方开铁路以图自强，认为铁路一开“轨道所至，瞬间千里，转输利捷，商贾繁兴”可以“开风气，进文明”，^[46]是欧洲国家富强之道。他还要求“各种专门职业，要讲求各该行业的科学知识”，^[47]学习西方用科学方法改良农牧。他

说：“无如嘉种不多，欧美方越国以求之，嘉者所获已倍，又用电气电光以煦育助长之，使可再倍，肥料则用化学以造之，人工则用机器以代之，一器可代数十倍，或数千百。”^[48]他认为近百年是“制造之天下”，“科学制器，利用厚生，如陈陈相沿用，直若古董玩具耳”。^[49]十分不满我国“物不外洋，制作不精，商不外洋，机器不明，屡掷千万金实于虚牝”。^[50]他极力谋求中国制造力的增强，提出“合群策以争制造之权，毋使东西邻，譬我役人役兽，终古獠豕之民也。”^[51]因此他极力支持朱志尧开办求新厂仿造和改良机器，当求新厂处境危难之时，他又上书段祺瑞，要求“或购或贷，收回自办，内以护实业之萌芽，外以顺天下之政轨，轨在保民而已”。^[52]基于对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发展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马相伯为震旦大学定的三条规矩中，劈头第一条便是“崇尚科学”。他十分注重研究科学的基础课程的设置。震旦大学质学科的正课就包括物理学、化学和象数学，其主要学习内容有算学、几何、代数、三角、立体几何、力学和天文学。他说：“盖科学之道，贵求其所以然；既得所以然，又贵执此所以然；以御其所以然，而徵诸实事实用也。”^[53]因此，他要求学生“手脑并用，研究与实验并重”，以求得“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只要有“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才能“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建国，以科学创造全人类之福利”。^[54]马相伯明确提出“崇尚科学”，传授欧美新知以应救国之需，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做是需要一定的胆识的。当“科学”和“民主”成为时代的口号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为此我们不得不承认，马相伯在提倡科学方面又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开创了近代学习科学的新风气，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为我国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杨杏佛曾声称“先生（马相伯）无财产，中国科学发达皆其财产”。^[55]于右任则称他“是开国时人瑞，为科学界伏生”。^[56]马相伯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贡献由此可见一般。

马相伯也十分重视对西方语言文字的学习，他认为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的国粹，“一国之语言，一国之心志所藉以交通也，一国之文字，一国之理想所藉以徵验也”。^[57]他提出学习西方必须先通晓西方的语言文字，他说“泰西成学之士，当国之家，国文而外，鲜不旁通三四国者，况世界竞争日亟，求自存必以知彼为先，知彼

者必通其语言文字。”^[58]又说“以西籍浩繁，非翻译所能尽收，若置不窥，于学问之道，便有所缺。又况泰西科学制造，时有新知，不识其文，末由取益，必致彼以累变，我尚懵然。劣败之忧，甚为可惧。”^[59]由此可见，马相伯把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作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前提条件。他本人也是学习外语的专家，到中年为止，马相伯学过七种外语：法语、拉丁语、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日语和朝鲜语。而震旦学院的创办也是以培养译才为宗旨，他规定震旦的学生必须掌握拉丁文和其他任一国语言文字。

马相伯鼓励青年学习西方，但并不赞成盲目学习西方文化。他既看到欧美文明发达的一面，也没有忽视其愚昧落后的一面，例如“生了病，用蚂蟥贴在太阳穴上，说能治百病；还没有笔，用鹅毛管当笔用”。“治水泡疮用烙铁烫，其方法之野蛮，几同于中国的走方郎中”。因此马相伯旗帜鲜明的反对不顾中国具体情况，实行全盘西化。他认为一国有一国的文化精神，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把中国数千年来遗留下来的文化精华全部置之脑后，而应该“洋为中用”。强调学生要联系中国文化遗产去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比较对照，融会贯通。他反对不加甄别的一味照搬法国耶稣会的教育模式，而提倡教育应从传教事业和基督教信仰中分离出来。他极力抨击奉西文为国语的现象，说：“夫大同之世，诚不能不通列邦之语，顾何必通国学堂，必专以某文为主课？相问为用，力除主客易置之嫌，藉破势力范围之说，是在诸公有以昌明其说。文自文，问学自问学，德行自德行，出奴入主，甚无谓也！”^[60]在他看来利用欧西文字则可，倾心于此则不可。因此马相伯虽然竭力提倡西学，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传播西学的工作中，但他明确表示那是为中国用的，是振兴中华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马相伯对西学是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

第二节 汲取传统文化精髓

马相伯不仅受西学濡染甚深，还有深厚的国学根底，他十四岁便在徐汇公学任国学老师，“为文作书，既能旁行，又擅直书。从公文尺牍，对联成语，到四书五经，典章制度，无不如素习科举者”。

[61]他提倡文科生应以国学为本，认为精于国学，然后研究西学，才能事半功倍。反之，精于西学，国学茫无所知，那么中国仅多一中国籍的外国人罢了。他在徐汇公学任校长时，强调学生必须中西学问兼顾，不可偏废，要求学生国学达到相当水平后，才能进入西学的学习，这一举措使不少学生虽进入西式学校系统，却也能在旧式的科举考试中夺魁。在办学过程中，马相伯规定：“凡投考者，以中西文俱优为最合格。或中文优而西文差，或西文优而中文差，或于各种科学有所长者，临时亦可酌量取录，唯中文差者，须自认于毕业限内，能加意补习为合格。其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屏斥”。[62]他与弟弟马建忠运用西洋语法于汉语研究，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专著——《马氏文通》，虽然马相伯并未署名，但大量的资料证明，他为此书的完成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他弘扬国学的意图也昭然若揭。马相伯十分蔑视为趋附洋人而习欧西文字的人，强烈抨击“我国自中学以上，不善国文犹可，不读西文必以为程度不高，而群情反对，反对之故，以遇西人而不能与之接谈也。接谈之久，虽遇华人而亦以西文为国语矣”[63]。他说：“一国有一国的文化精神，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尤其是我国自有数千年的历史，当自家知道爱护发扬它。”[64]他对《左传》赞不绝口，认为“此种谨严巧妙，几夺天工的文章，不但在过去的文言文当中，视为宗匠，即现在做白话文也应当奉为圭臬，至少要把它的不朽处承袭将来。”[65]李白的“天马行空的天才，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66]而杜甫的天才“不亚于李白，……他处处要积极救世救国，悲天悯人，而他的诗又字字句句用力，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诗也是无美不备。细腻处真是‘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灭尽针线迹’。意境高妙处，却又是‘想入非非’”。[67]同时，马相伯也对传教士中西文程度不高的现象耿耿于怀，认为“传教之士，学问不高，何以开启华人，维持教务”。[68]他对传统文化精华的溢美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外国传教士蔑视中国文化的态度十分不满，屡次要求天主教神甫学习中国国学，“要多读中国书，明瞭中国习惯风俗”，[69]极力推崇利玛窦等人的“合儒”“补儒”即将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政策，力图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

当然，马相伯也反对不加批判地继承国学。他抨击科举八股之

学为“奴隶之学”，“譬之一家之中，其家主虽粟麦之不分，是非之莫辩，然其奴隶必崇拜之，服从之。”^[70]认为中国的经学完全是空虚的形式，使人养成两个毛病：冬烘头脑和欺诈心理。他说：“虽诸子百家，求其能具科学形模，有条有理，有界说之严明，部分之适当，一一探本穷源，证实其因果，与因果之可能。俾坐言起行，可开物成务者，百无一二。诚如欧阳子所言：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者，于世毫无损益，而不足为有无也，悲乎！”^[71]又说：“孔子学说，只是一种极肤浅的伦理学，即我所谓‘行宜’学。他的教育就是要把一个活泼泼的青年拘束得像槁木死灰一样。”^[72]他对宣扬女子“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思想嗤之以鼻，对损害女子身心健康的裹脚也极大地加以抨击，说纳妾是“夺其财产，毁其人格，丧其羞耻，灭其灵光”。^[73]提出家长要守那“父道”和“夫道”，切不可对妻女任意责骂，甚至支持寡居的儿媳再嫁。1916年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逆流时，他极力反对“奉孔子之道，为国民教育修身之大本”的做法，声称“今后国民教育，宜应世界之潮流，修身教育，急宜输入功利派之伦理思想，庶民生可裕，国计可饶，而断不宜存留宪法草案之第十九条，犹言孔子动机派之伦理思想，以为国民教育前途之大阻碍也。此是国民将来之死活问题，教育即国民之死活问题，诚不可不慎重而断行之者也。”^[74]他说尊孔“不但要把活泼泼的青年方兴未艾的天性残折殆尽，恐怕连国民一点‘白刃可蹈’的反抗精神，也都消磨于规行矩步之中了。”^[75]认为传统的“学优则仕”的思想使人们治学只为谋官，“以学稼学圃为小人，又以货殖为不受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实业之不讲，此我国之大愚也。”^[76]由此可见，马相伯对国学也是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第三节 坚持教育独立

“教育独立”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思想。其大致内容有教育经费独立，教育事务独立，教育脱离政治而独立，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高等教育之学术独立。即要求摆脱封建政府和外国势力的桎梏，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资产阶级新教育。^[77]在我国最早从理论上提出教育独立主张的是蔡元培，他在《教育独立议》

中提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78]主张实行不受政党和教会控制的“超然”的教育。但远在他提出之前，马相伯就在他的教育实践中体现出了教育独立的思想。

马相伯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内之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以裁成有用之才”，^[79]他反对教育为任何政治或宗教服务，认为教育的使命在于培养人才，教育的重心应在于道德的建设，即人类精神生活的建设。因此，他一生都试图维护教育权的独立。于右任称他“为国家储才养士，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以开教育独立之风气”。^[80]

马相伯宣扬教育独立的思想首先表现在使教育独立于教会。震旦创办之初，因学院借教会的老天文台余屋为校舍，又多请外籍传教士兼课，为防止把震旦学院办成神学院，马相伯提出“不谈教理”的原则。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却对学生讲：“学校是研究学术的机构，不是宣传宗教的地方。”^[81]“不能把震旦学院办成宣扬宗教的学校，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均应退出学校的领域。”^[82]马相伯这一教育理念，与法国天主教会试图使教育服务于传教事业的原则相违背。天主教会悍然发起掠夺震旦教育权的行动，妄图使震旦学院变成他们宣扬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阵地。为捍卫教育独立，马相伯毅然率众离开了凝聚了他半生心血的震旦学院，重办复旦大学。为免重蹈覆辙，乃向社会募捐，自力更生，不再依附外人，加强了学校的自主性。1916年，为了反对袁世凯以孔教为国教，反对“国民初等教育皆学孔子”的做法，马相伯站出来再一次重申了他教育独立于教会的信念：“今日欧洲各国，……纷纷逐出学校中之耶教，置诸学校之外，……何我国尚不明世界大势之所趋，而必奉孔子之道，为国民教育修身之大本，且规定于刚性之宪法之中，使之不可动摇哉？”^[83]其次，马相伯教育思想还表现在教育独立于政治上。他办学时强调“学生在校不谈政治”。其目的是使学校摆脱官方的控制，避免学校成为清政府维持其统治的工具。他反对把学校当官的过渡阶梯，反对弥漫中国社会的、尤其是官僚阶层所信仰的功利主义教育观。他要求学生多学知识，不要只为混张文凭谋个资格以求个人的晋升。办震旦时，马相伯明确提出：“予创震旦，故欲诸生习实学而转授国人，为学干禄者戒。”^[84]同时，他屡次提

出函夏考文院中“一切制度、职务、职权，上不属于政府，下不属于地方，岿然独立，唯以文化为己任”^[85]“该苑不预政治”“其职在民不在官”。^[86]其企图实现函夏考文苑的独立和不受政府干扰的意图显而易见。

马相伯尝试了使教育与教会疏离，使教育与官府疏离，坚持教育应该是独立的，有着自己的使命。但是，他始终没能找到一块不受外来干涉而得以研究中西学问的净土。震旦的创办一开始便依附于教会，“以经费师资之绌乏，而借地借才；以借地借才，而教育之权界不清”，^[87]最终导致冲突和分裂，使马相伯不得不黯然离去。而法国耶稣会士重新开办的震旦虽培养了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尤其在机械、法律和医药诸方面，却带有很浓的殖民化色彩，授课除中国语文外，其他全用法语，完全违背马相伯当年的创办意向。从教会摆脱出来的复旦却又陷入官府的控制之中。复旦的校址是两江总督周馥拨的吴淞提督行辕，并接受了他汇的两万两银子。在复旦创办之初，就有人在上海出版的《大陆报》上对此提出忠告，以为当初为了维护独立自主的精神而退出震旦，如今又为“区区觅一校舍，而必请于官场为赞助”，“款出于官场，而必自予官场以干涉之路”，“诸君之不惬意，恐更有出教会上着”^[88]。1905年的《复旦公学章程》开宗明义地承认：“本公学由各省官绅倡捐”。章程表明，它的体制与1904年清廷颁布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若合符契。此时的复旦不是大学，而是接近于当时的官办高等学堂。在1907年当学校经费困难时，又由两江总督端方奏请清廷，得到每月一千四百两银子的常经费，使复旦得以生存。辛亥革命后，复旦在上海的复校也得益于官方的资助，1913年复旦董事会名单上也出现了孙中山、陈英士、于右任和王宠惠等政界名流的名字。复旦从此也越来越偏离马相伯的理想，最终成为政府的国立大学。1910年以后，他又介入创办一所新的天主教会大学——辅仁大学，虽然此校座落于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北京，远离耶稣会的传教中心上海，但是必须征得教皇准许这一现实，又与他的超越性追求相违背。与此同时，他为建立“函夏考文苑”而作的努力又成泡影，再次显示了他的超越性追求难以摆脱中国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实现。在当时激荡的国内政治环境中，马相伯“不谈政治”的规定也形同虚设。事实上，马

相伯极力的维护和支持学生的爱国革命运动，甚至招收因一部《半哭半笑楼诗钞》而受清廷通缉的于右任入学，还豁免了他的一切费用。马相伯此举使复旦成为“最具革命精神”的学校。

第四节 倡导自主之学

马相伯教学严谨、认真，但绝不独裁，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学，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他说：“科学之教授，尤当自由，否则图读古书，物而不化，而所授与授法，皆固步自封，无以应世界维新之用。”^[89]

因此，无论是在震旦，还是在复旦，校园内都弥漫着民主自由的教学气氛。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不同意见通过讨论取得正确认识，反对拘泥于文字训诂和生硬灌输，“养成学者自由研究之风”，并“挈举纲领，开示门径”即在教学中给学生指引一条正确的思维线索，引导学生思维能力“上路”，促使他们进行分析综合，找寻探求结论的方向。复旦创办以后，马相伯开办了各种研究会、演讲会，规定每星期召开演讲会，定出学术讨论题目，由学生各抒己见，并进行评比。马相伯反对将天真活泼的青年拘束得像“枯木死灰”，主张国民要有“白刃可蹈”的反抗精神，即使是自己的父亲违背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也要大义灭亲。马相伯因宗教的原因，认为世界万物都由上帝所创，因而他认为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是谬天下之大论，极力加以批判。但马相伯并不因为与严复有过激烈之争而存门户之见。1907年他辞去复旦校长时，还热情地推荐严复出任校长。后来甚至与严复等合谋办“函夏考文苑”。由此，“学术自由，思想独立”成为复旦办学的特征之一，使复旦培养出来的不是一班唯唯诺诺的奴隶，而是有思想有个性的一代新人。同时马相伯这种办学思想和方针，对其他学校如后来的北京大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当时封建官僚控制的南北各大学堂采取的压制办法迥然不同，马相伯推行学生自治的管理办法，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马相伯自任“监院”（校长），其余各种事悉归学生管理，司其事者称“干事”，除一总干事和一会计干事为固定职务外，其余干事由学生民

主选举，轮流担任，任期半年，按时改选。通过学生自治，学生代表直接参与学校行政的管理，如自办食堂、合作社和储蓄银行以管理经济生活。而后还有“民主法庭”的设置，以解决同学间的纠纷事故。学校的初级教科，也由高材生转相传习。这些措施，可以说是马相伯民主自治思想的具体而微的实验。“盖先生以吾国政治习于专制，国民自治能力久已消失，欲藉此为实施民治之实验地也”。^[90]学生自治也确实锻炼了学生的自治能力，培养了他们的参政意识，为复旦成为“革命之学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复旦成为封建教育汪洋大海中的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小岛，呈现出一派生机。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引导复旦走在进步潮流的前列。“五四”时，上海最先响应的正是复旦的广大师生。沪上英文《大陆报》也曾赞扬复旦学生“最具民主精神”。

马相伯办学时对课程的设置也是灵活的，学生有较强的自主性。它规定震旦学院的学生第一年读拉丁文，而第二年读何国文便由学生自由选择。质学以数理化为主，有愿学者，“学院可特别教授”，肄业期相应延长两年。

马相伯在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生管理上都极力主张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他提出的自主之学既不同于传统的奴隶之学，也不同于自由之学。他说：“自由者，今日欲左则左之，明日欲右则右之。而自主则不然，有坚忍不拔之气，强力不返之志，且而矢之，则万变不离。”^[91]当时南北各地所设立的不少高等学堂，除由外国教会所办外，都是为封建官僚们所统治，学校从管理到教学内容，都以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洋务派的教育思想为主导。校中堂规森严，对教师和学生的控制极紧。如京师大学堂规定：“所有学堂人等，自教习、总办、提调、学生诸人，有明倡异说，干犯国宪及与名教纲常显相违背者，查有实据，轻则斥退，重则究办。”^[92]在教学内容上，则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维持封建意识形态和秩序。由此可见，马相伯提出的“自主之学”的教育思想公开向封建蒙昧主义宣战，体现了崭新的资产阶级办学思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哺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具备鲜明的先进性、革命性和民主性。

第五节 推行先进的教学方法

马相伯一生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他既不满传统的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的教学方法，也反对教会专制的高度集权的教育方式，便从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先进的教学方法。

1、因材施教。他反对教会不加区别的刻板的教育做法，主张采取因材施教的办法分别对儿童、成年人、妇女进行教育。当时，由于中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饭吃，做父母的终日为衣食奔波，没有工夫来讲儿童教育，再加上中国师范教育不完善，教师生活困苦，使许多小学教师不能安心研究儿童生活、忠于职守等，中国儿童教育不良。对此现状，马相伯忧心忡忡，他说：“保育儿童，家庭天职；因为不能独立的儿童，不好好的保护他们和教育他们，就要像那没有保护好的嫩叶，或夭折或失了美观呢！”^[93]认为儿童天真活泼，喜爱活动，有丰富的想象力，因此教育儿童“要十分小心地培养儿童的幻想力，利用这种幻想力发展他们创造的天才”，^[94]他严厉批评了对儿童的好奇心或好动的倾向，以及时时发问的兴趣，每每报之以厉声厉色，使儿童惧怕，或则以谎言欺骗儿童的作法。认为这样就把儿童这种天才或幻想毁灭了。他提出：“对儿童的发问绝对不可表示憎恶的态度，不可有丝毫憎恶的心情，应当小心解答他们的问题，甚至在成人为极无理由的问题，都要设法指导他们。”^[95]他认为用搪塞或恐吓的办法、禁止孩童们自由发问，会扼杀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和爱好，将孩童们弄得愚昧无知。马相伯反对向儿童灌输鬼神观念，用鬼怪之说来恐吓儿童和无论凶吉祸福都求神拜庙。认为这样把儿童的心灵弄得愚昧，盲从迷信，而缺乏科学创新精神。主张老师和父母对待儿童要“诚实无欺”，要注意成人对儿童的榜样作用。另外，马相伯反对用食物的赐予或禁止为赏罚儿童的工具，认为这样会“种下他们后来争名夺利的祸胎”。

马相伯认为女子是家庭和社会的中坚，我国“人种卑劣”是因为“全无胎教”，由此，他积极地投身于促进女子教育发展的运动当中。他积极资助静宜女校，赞助英敛之的妹妹创办培根女校，捐款于上海启明中学，并支持两江女子体育学校的创办。他要求女子

从封建桎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改变“纤弱不堪”的软弱形象，具有和西洋女子一样的健康美。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女子也必须“自食其力”，认为女子不仅能担当家事，还能充任社会职务如缝纫业、卖票员、幼稚园和中小学教师等。至于公共社会事业中的地位，如官吏、律师等女子如果有学识和才干也能充当。同时马相伯认为国家应制定特别法规来保障女子的人权。从这方面说，马相伯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和倡导者，为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马相伯主张加强成人教育，要求放宽学生的年龄，既招十几岁的青年，也招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他说：“年轻和年长的，甚至三四十岁的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皆应一视同仁，尽量收纳，因为中国的情形与欧美各先进国不同。我们的青年须教育，我们的成人尤须教育。因为他们学了一点，马上到社会上去，就有用。”^[96]筹办辅仁学社时他建议“来学者不必限年龄”。而震旦学院的学生中“有八个少壮的翰林，二十几个孝廉公”。^[97]他反对“视十五、六岁华生等于五、六者授之”^[98]的做法，指出“功课宜合国情，而教授之法尤应合人心理”。^[99]针对成年人有较强的自制力、理解力和自学能力的实际，采取“导门径”的方法，将学生引进科学研究的大门，然后由学生自行研究。他规定一天当中，四小时为授课时刻，四小时为独修时刻。由于成年人已有较强的文化基础，马相伯抛弃外国人教中国儿童所用的“浅薄鄙俗，毫无意义”的教材，而采用西欧名著为教材如西塞罗演说为拉丁文课本；选莎士比亚的著作作为英文课本等。在授文法和名人格言时，也常引用我国典籍成语来解释课中文句。这使学生不知不觉中受中西古典文学的熏陶而受益匪浅，对学生已有较高造诣的国学采取自修方法，但每学期结束时，布置命题作文一篇，以考察成绩，这样的安排，有利于学生集中精力学习原先不甚了解的课程，同时对基础较好的国文也不放弃，有利于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知识。

2、循序渐进。马相伯反对洋人教习妄图一蹴而就的教法，认为有些“颞颥”，“譬如，他们教英文，一开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学生摸不着头脑”。^[100]他教学生十分注意从基础教起，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如教外语，他总是从最基础的拼读教起，使学

生渐渐掌握外语入门的钥匙，可以独立地拼读，阅读外语，最后掌握一门外语，这种教法使学生三个月内能与外籍教师对话。教数学，他不仅教他们具体的演算技术，还着重教他们数学的原理，使学生都从根本上理解每一算术的作用，并且教他们用代数法演算数学，引导学生进入科学研究的王国。

马相伯提出讲授一门新的学科或提出一种主张，都必须使学生由“知”到“信”。反对迫使学生毫无异议、毫无选择地接受一切的做法。受益于这种教育的邵力子说：“马师的教育方法，偏重‘有容’，使学生由知而信。这是马师最了不起的地方，他之所以被称为教育家，就在于此。”^[101]

3、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马相伯不仅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播，还十分看重学生德育和体育的健康发展，以为国家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是马相伯办学的指导思想，因此他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常教导学生：“你们要多做些爱人类爱国家的工作，更多吃些苦，多做几件有益社会的事情。我自己是老了，希望你们年轻的人，多替中国争气。”^[102]马相伯的爱国行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行为，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马相伯鼓励学生就国家、世界大事发表演说和看法，他说：“演说是人类社会中发表自己意思的一种工具，演说最好的人不见得就是好人；而真正有非常之才与德的人，其演说必有可观。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103]他规定每星期日或星期六下午开演说会，校长及校员、教员登堂演说，并设“演说学”作为文科的必修课。为培养学生的演讲才能，作为“中国第一演说家”的马相伯的海人不倦，将在神学院所获之演讲技巧倾囊转授给学生，例如开头怎样能抓住听众、怎样分段，结论怎样使人对于他的演讲获得具体的了解，怎样发挥，怎样以动作助语势等。他强调演说不仅在形式，而且更应注重内容，演说者应成为一名德才兼备者。也就从这时开始，中国人才开始重视演说。而在马相伯的熏陶下，复旦学生都有演说的才能，“在出校后，从事政治革命运动，受用不尽。”^[104]

马相伯还十分重视对学生身体素质的培养。他认为种族的羸弱

是国家日益衰弱的原因之一，提出“身强才能为国有用”。他说中国古代就是文武合一，文士道就是武士道，汉朝才把文武分开；只有文武合一，才能强身建国。在办学时，马相伯延请法国军官做教练，每星期授兵式操三课，全校学生同时上课，分编四队，步伐操伐一丝不苟，有时还率领学生荷枪实弹，在法国兵营打靶。他制定体操规则，规定：“每日体操，皆由教员统计分数，不得无端旷操”。^[105]为加强学生的锻炼意识，他甚至还拟设体育研究部。多年后，当年的学生于右任回忆说：“诸同学戎服荷枪，行列整肃，俨然国家一正式军队焉。”^[106]通过强调体育的重要性，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身体，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还给学生以习兵用武的预演机会，以备日后革命所需。另外，马相伯还支持陆礼华创办两江女子体育学校，并担任该校的董事长。当两江女篮战胜日本和朝鲜女篮，载誉归国时，年过八旬的马相伯亲自去迎接，感谢她们“为国家、为中华民族建勋”，称她们为“中华民族的女英豪”。^[107]他要求以兵法部勒子弟。小孩子“在十岁内就要操练体格，将来身体健旺，才算大中华的国民”；^[108]学、农、工、商也都进行会操，使“国民有探险冒险的精神和运用体质的能力”。^[109]

马相伯重视体育，但他反对学生参加体育比赛而荒废学业，反对学校为了在比赛中获得好的名次，录取部分学生时只看体育成绩，而不顾其他方面。认为这样会在学校中造成一个专注于体育的特殊阶级，这些人平时只注意运动，“十有八九，其它功课都不能及格”。结果反而害了这些学生，“待他毕业后，除了在学校中任畸形的体育教习外，简直没有它种生活技能，这实是当前一个大问题，余希望全国教育界诸君子深切地注意及之。”^[110]马相伯的这些见解对当今不少学校对体育生事事优容，不注重其文化道德修养的做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同时，马相伯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他一生从没放弃过学习。在八十岁的时候，他开始临池学字，到了九十岁，却又学起了绘画。在长年累月的学习中，马相伯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

第一，马相伯提出学习要多思。他说：“哲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思想的方法，由这种思想的方法，不但要解释人生问题，而且要解释人类所生息的世界问题，即宇宙问题。”^[111]他曾痛心疾首地指出：

“中国人不但懒于行动，尤其懒于思想，所以只重记忆。在文化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莫不如此，就是说只知依样画葫芦，等于只知贩卖，不愿制造。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买办头脑’。”^[112]因此，他在教学中常启发学生多思，引导学生举一反三。

第二，马相伯认为学习要专心。他说：“凡事在专而已矣，专则有成”^[113]。他在办震旦时，要求已有国学功底的学生专心于欧西文字，“庶业以专攻而精，心以致一而逸，不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114]马相伯也对这一原则身体力行，他学数学时，“几乎发了狂，夜间睡觉的时候，仰视帐顶上，都隐隐约约，闪闪烁烁，出现了许多数目字，梦中也发现四处都是数目字”。达到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迷”^[115]的意境。由于专注于数学，他终于编成《度数大全》一书。

第三，马相伯提出学习要务实，忌好高骛远。他在家书中写道：“心好高妄想而力不能，故心地无真平安，是以学问无进境。盖学问之道，妒无用，夸无用，惟有收放心方有用。”^[116]他说：“予治中学，先明训诂，乃能读三代汉魏之文，亦如治泰西学术，先明希腊拉丁，而后易通英法各国之文；语根本源，一览便知，如识训诂，乃能读古书也。”^[117]主张学习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第三章 马相伯教育思想的特点

1、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马相伯创办震旦复旦时正值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受这种革命思潮的影响，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他始终把爱国救国放在第一位，以“革命救国”号召青年学生研究近代科学，要求学生为挽救国家危亡，振兴中华而献身。他说：“诸生之来学也，皆抱宏志而来，为学成救国，或为马志尼，或为俾斯麦。”^[118]他在震旦时便收留庇护革命学生，招收革命青年入学，他培养的学生如于右任、邵力子后来成为民国的柱石；光复会领袖蔡元培与他雅善，甚至还有半师之谊；而且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前，身为江苏谘议局议员

的马相伯曾暗中救援过准备起义的新军。而复旦被誉为“革命之学校”，成为培养革命志士和建设人才的摇篮，正是马相伯当年倡导的必然结果。晚年的马相伯更是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被人们尊称为“爱国老人”。他曾沉痛而愤慨地说：“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把中国叫醒！”^[119]马相伯一生为国家为真理奔走呼号的劳苦精神，都包含在这一句话里了。其次，马相伯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封建制度逐渐没落并最终崩溃的时代，反封建成为当时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因此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又带有很强的反封建性。马相伯从小就对皇帝无所不知的观念嗤之以鼻。他认为“汉高祖本是一个大流氓，自然谈不上什么学问，项羽是一个莽荡大夫，说白些，就是一个粗鹵汉子，更谈不上学术……”^[120]把古往今来许多受人称道的皇帝都贬得一无是处，说这些“治人者”都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脑满肠肥，蠢如鹿豕。”^[121]他强烈抨击“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的专制思想，认为这种思想使人们没有国家思想，没有爱护国土的观念，只知道种田完粮、巴结皇帝，争夺无上的权柄，是国家落后的根源。就此，他提出民治思想，要求“厉行民治，实行民主”。

2、浓烈的个性色彩。第一、民主性。马相伯在徐汇公学时就接受近代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思想影响。他深信中国的改革在于“民治”。一生都孜孜不倦地为实现中国的民主宪政而努力，也为此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因而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出很强的民主性，主要体现在“自主之学”、“学生自治制”之上。学校的气氛是民主的，学生在处理自己的事情上有发言权，受到尊重，对事务的处理都体现了“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马相伯希望由此培养出具有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的一代新人，为实现中国的民主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当时封建枷锁牢牢地禁锢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社会环境下，马相伯此举无疑给黑沉沉的社会带来一丝光明，吸引了不少革命青年。震旦和复旦的学生大都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自治能力和参与精神，关心国家前途，热心社会改革，这无疑是马相伯首创民主之风的功劳。第二、兼容性。由于清末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不少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如何正确看待中西文化便成为当时的时代课题之一。马相伯是当时能比

较正确的评价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优缺点的少数人之一。他既不附和国粹派凡中国皆好、外国皆坏的主张，也不支持民族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的看法。他在整体上深深仰慕两种文化的同时，也对两种文化的糟粕持批判态度。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实现融合两种文化的精髓、两种文化的长处这样的理想。他提出“学问社会，世界人类共有，不必分中西以立异也。”^[122]“凡欧美新科最精最确者，则以介绍于中华；中华旧有之学、道学、美术等莫不善善从长无敢偏弃”。^[123]

显然，作为一名受西方教育的先进人物，马相伯无疑是走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前列，其教育思想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但是，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马相伯也具有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局限性——软弱性和妥协性。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对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态度上。他力图摆脱帝国主义教会的控制，实现教育的独立，却因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而终身受制于教会。作为在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教会大学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马相伯受天主教会伪善的外表蒙蔽，一度把教育救国的梦想托附于教会，这无疑是与虎谋皮。此举也直接导致他辛辛苦苦筹来的资金和初具成效的震旦学院都“为他人做嫁衣裳”，成为法国天主教会的囊中之物。而1908年震旦学院拟在法租界建新舍，向马相伯募捐，马相伯也慷慨解囊，捐献金四万元、英法租界地八处，约值现金十多万元。1912年他又上书罗马教廷，希望教廷能在中国办一所公教大学，希望教会“多遣当今博学良善而心谦，广为师傅”。毋庸置疑，马相伯仍对天主教会抱有幻想，仍希望他们能为中国培育一些人才。这就充分表露了他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不足，没有看到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学校掠夺中国教育主权，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本来面目。因此，他虽然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有些微的反抗，如率众离开震旦学院等，却始终没有跟法国天主教会彻底决裂。

另一方面，马相伯也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其教育思想具有不可避免的封建性。在官场摸爬滚打不少年的马相伯，对清政府的昏愤无能深有感触。他针对官场的腐败现象，开了许多改革时弊、促进发展的药方，却没有真正认识到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唯一办法

就是推翻已经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其政治思想是带有浓烈封建性和妥协性的君主立宪制。

结语

尽管人们对马相伯教育思想及其对中国教育发展的贡献还知之甚少，但无可否认，他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他创建了震旦、复旦和辅仁三所大学，是培根、静宜等学校的赞助人，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建立了功勋。

马相伯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和独具特色的教育风格，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教育中始终坚持中西文化交融的立场，矢志不移的献身于教育独立的理想，毫不动摇的倡导自治之学，并继承和发扬了中西方合理的、先进的教育理念，为祖国培养了一代英才。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加大对马相伯教育思想的学习和研究，继承和发扬马相伯先进的教育理念，使教育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更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

注释:

- [1] 马相伯,《从高丽回国以后》,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6页。
- [2] 马相伯,《捐献家产兴学字据》,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 [3] 马相伯,《从震旦到复旦》,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6页。
- [4] 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中央日报》,1937.5.16。
- [5] 梁启超,《祝震旦学院之前途》,宗有恒、夏林根编,《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 [6] 同[4]。
- [7] 图沫,《辅仁大学的过去与将来》,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 [8] 马相伯,《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 [9] 同[7]。
- [10] 苏仲翔,《马相伯与考文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4月。
- [11] 韩希愈,《反帝爱国百岁老人——马相伯》,宗有恒、夏林根编,《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 [12] 叶奕乾、孔克勤,《个性心理学》,华东师大出版社,第183页。
- [13]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97页。
- [14] 张若英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海文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第六十七辑影印本。
- [15] 马相伯,《我的孩童时代与宇宙观与家教》,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5页。
- [16] 章开沅、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页。
- [17] 马相伯,《家产立典记》,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 [18] 马相伯,《捐产笔录》,宗有恒、夏林根编,《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 [19] 同[12], 第189—190页。
- [20] 同[12], 第186页。
- [21] 同[15]。
- [22]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中华书局1963年版。
- [23]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 [24] 李楚才,《帝国主义侵华史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 [25] 1818年9月10日英国伦敦布道会在马六甲创办的教会学校,1842年迁到香港。
- [26] 同[16],第48页。
- [27] “马礼逊教育会”为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39年11月4日在澳门创办的一所小学。1842年11月1日迁至香港。
- [28] 同[23],第2页。
- [29] 同[14]。
- [30] 研治室主,《徐汇中学之真精神》,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页。
- [31] 马相伯,《我的幼年》,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4页。
- [32] (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 [33] 张若英,《苦闷了一百年的马相伯》,附录于张若英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海文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第六十七辑影印本。
- [34] 同[16],第2页。
- [35] 李天纲,《信仰与传统》,附录于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6页。
- [36]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 [37]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 [38] 陈传德,《马师相伯创办震旦学院之特种精神》,宗有恒、夏林根编,《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页。
- [39]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538—549页。
- [40] 马相伯,《震旦学院章程》,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

41—43 页。

[41] 马相伯,《复旦公学章程》,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50—61 页。

[42] 陈景馨,《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88 页。

[43] 同[4]。

[44] 马相伯,《原言自序》,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643 页。

[45] 马相伯,《第十一次广播演说;从立国要义观察国货年的重要》,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997 页。

[46] 马相伯,《开铁路以图自强论》,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9 页。

[47] 同[45]。

[48] 马相伯,《农业改良友助社简章》,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90 页。

[49] 马相伯,《徐文定公与中国科学》,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554 页。

[50] 马相伯,《〈求新厂出品图〉叙》,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03 页。

[51] 同[50],第 104 页。

[52] 马相伯,《致段祺瑞》,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97 页。

[53] 马相伯,《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424 页。

[54] 马相伯,《新年告青年书》,《申报》,1932.1。

[55] 夏林根、宋全夫、曹宠,《一老南天身是史》,宗有恒、夏林根编,《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42 页。

[56] 《申报》,《马相伯先生九十秩寿辰之余闻》,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058 页。

[57] 马相伯,《古文拾级》,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01 页。

- [58] 同[41]。
- [59] 同[41]。
- [60] 马相伯，《北京法国学术研究会开幕词》，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 [61] 同[35]。
- [62] 同[41]。
- [63] 马相伯，《北京法国学术研究会开幕词》，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 [64] 马相伯，《宗教与文化》，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6页。
- [65] 马相伯，《文谈》，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8页。
- [66] 同[65]。
- [67] 同[65]。
- [68] 马相伯，《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 [69] 马相伯，《学术传教》，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0页。
- [70] 《震旦学院开学记》，《苏报》，1903.2.28。
- [71] 同[64]。
- [72] 马相伯，《孔教所给与中国的影响》，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0页。
- [73] 马相伯，《天条十诫内容一斑》，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1页。
- [74] 马相伯，《书〈请订儒教为国教后〉》，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
- [75] 同[72]。
- [76] 同[74]，第252页。
- [77] 《中国教育史简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 [78] 同[77]。
- [79] 陆永玲，《站在两个世界之间——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朱维铮编，《马相伯集》

-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6页。
- [80] 同[4]。
- [81] 韩希愈，《马相伯的办学治校》，宗有恒、夏林根编，《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
- [82] 同[55]，第25页。
- [83] 同[74]。
- [84] 同[81]。
- [85] 马相伯，《函夏考文苑文件十种》，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 [86] 章太炎《与袁总统书》，《民权集》第一卷，第1页。
- [87] 严复等，《复旦公学募捐公启》，《复旦大学志》第一卷，第51-53页。
- [88] 《吼》，载于《大陆报》，第三年，第三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 [89] 马相伯，《〈约法〉上信教自由解》，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 [90] 同[4]。
- [91] 同[70]。
- [92] 同[39]。
- [93] 马相伯，《保育儿童和尊敬女子》，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7页。
- [94] 马相伯，《儿童时代的幻想与儿童教育》，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3页。
- [95] 同[94]。
- [96] 马相伯，《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0页。
- [97] 同[3]。
- [98] 方豪，《马相伯先生文集续编》，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76页。
- [99] 方豪，《马相伯先生文集》，北平，上智编译馆，1947年，494页。
- [100] 同[96]。
- [101] 邵力子，《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新华日报》，1939.11.25。
- [102] 《一小时会见马相伯先生》，附录于张若英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海文出版社。

- [103] 马相伯,《中国人的演说》,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1页。
- [104] 同[81]。
- [105] 同[41]。
- [106] 于右任,《追念相伯夫子并略述其言行》,宗有恒、夏林根编,《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 [107] 马一民,《记我国近代教育爱国老人马相伯》,文史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121-126页。
- [108] 马相伯,《国民都要受军事训练》,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0页。
- [109] 同[108]。
- [110] 马相伯,《关于本届全国运动会》,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0-1082页。
- [111] 马相伯,《谈屑》,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5页。
- [112] 同[111]。
- [113] 《家书选辑》,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9页。
- [114] 同[113]。
- [115] 同[31]。
- [116] 同[113]。
- [117] 同[14]。
- [118] 赵云浦,《马相伯师百龄寿言》,宗有恒、夏林根编,《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 [119] 同[33]。
- [120] 马相伯,《中西各国元首学问上的比较》,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8页。
- [121] 同[120]。
- [122] 同[14]。
- [123] 马相伯,《美国本笃会士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稿》,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8页。

参考文献:

- 1、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2、宗有恒、夏林根编,《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3、方豪,《马相伯先生文集续编》,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
- 4、方豪,《马相伯先生文集》,北平,上智编译馆,1947年版。
- 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 6、刘真编,《师道》,台湾中华书局,民国六十六年八月四日版。
- 7、《中央日报》,1937年。
- 8、《苏报》。
- 9、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委会《风云录》编辑组编,《风云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
- 10、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 11、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 12、许美德、巴斯蒂等著《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 13、张若英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海文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第六十七辑影印本。
- 14、叶奕乾、孔克勤,《个性心理学》,华东师大出版社。
- 15、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 16、杰西·格·卢茨(美)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 17、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 18、卫道治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19、江湜白主编,《文化冲突中的抉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20、张瑞璠,《中国教育哲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 21、郑登云编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 22、《中国教育史简编》编写组编,《中国教育史简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 23、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 24、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史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周山考

2003年4月12日